

论阎连科小说中权利对人的异化问题

——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例

张欣宇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阎连科是当代文坛中有着强烈个人特色的作家，他在乡村权力话语的烛照下，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乡村世界。阎连科的笔端深深地扎根于耙耧山脉，近乎固执的展现农民苦难的生活状态。本文试图以阎连科的“后合作化三部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例，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思考权利对人的异化问题，以期更加深入的认识阎连科小说中权利书写的含义。

[关键词]权利；乡村；病态；异化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8.224

引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阎连科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他凭借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与大胆的写作风格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阎连科的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于1979年在军区战斗报上发表，当时并未激起多大的水花。直至1998年《日光流年》的问世，才使他在文坛上拥有了一席之地。阎连科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始终以一个农民的姿态辛勤耕耘，写作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那片养育他的耙耧山脉。但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不难看出阎连科对于土地和乡村有着复杂的感情，甚至在访谈中他还大方承认对于城市的渴望。他说“在社会层面，我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一、城市；二、权利；三、生命。”

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使得阎连科对城市、权利和生命都充满着渴望，因此他的小说也大多围绕个人的崇拜展开书写。其中对于权利以及权利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描绘更是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阎连科说：“我生活的那个乡村小镇，家庭贫困……村长在一个村子里一手遮天，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生于50年代的阎连科，童年中充斥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在普通家庭饥一顿饱一顿的年代，村干部却能吃上白面馒头，这让阎连科在童年时期就产生了对权利的朦胧崇拜。阎连科最初的梦想就是逃离这片苦难的土地，如果不能逃离，那么能当个村干部也是好的。梁鸿说：“他作品中所描述的是个体的人如何追求权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精神和尊严，权力是一个实在而具体的生活目标，是一个农民最大的文化理想和生存理想。”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后合作化三部曲”《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对于权利对人的异化问题有着深刻的反思，阎连科用其十分熟稔的狂欢式写法，向读者展示令人窒息的苦难大地。

一、《日光流年》：权利对生命的腐蚀

《日光流年》是阎连科经由灵魂内的真实去体认人和社会而创造的令人震惊的“真实”图景。三姓村历代村长都在带领村民为了抵抗活不过四十岁的喉堵症而努力，在多生多育的人口政策、种油菜政策、翻地政策、开渠政策均以失败告终之后，新一代权利中心司马蓝自杀，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司马蓝不是愚公，三姓村人也没有神仙助力。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为医治病态社会不断开出药方，但以三姓村为代表的社会得的是绝症，根本无可救药。所有人只能在愚昧与黑暗中跌跌撞撞的做无用的挣扎，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还是改变不了早死的结局。

三姓村是病态社会的缩影，这“病”从何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三姓村的权利崇拜。作了村长就等于作了乡村的皇

帝，拥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特权。“村长是全村人的爷哩，叫谁干啥谁就得去干啥。”这种思想在村民心里根深蒂固，在三姓村这样一个三不管地带，村长就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调度一切的权利。对权利的崇拜和对生命的渴望本是人之常情，可悲的是他们被冲昏了头脑，为了权利、为了活下去出卖一切，包括纯真的爱情和宝贵的身体，人性也在权利的冲击下不断异化。其中蓝四十是这场权利争夺下最可悲的牺牲品。在轰轰烈烈的权利捍卫战中，蓝四十仿佛是一件物品可以随时被拿来交换。她的身体被客体化，生存的尊严和欲望都被父亲和爱人的权利崇拜所瓦解，最终蓝四十悄无声息的自杀了。爱情本是该是纯洁无瑕的，但蓝四十对司马蓝的爱却变成了司马蓝夺取村长之位的垫脚石。

三姓村人的生存状态是血淋淋的，除了身体他们一无所有。三姓村男女老少一生都在为延长寿命做不懈地努力，讽刺的是，他们在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千方百计的延长自己的寿命。这形成了一种吊诡，他们到底是在拯救生命还是在毁坏生命？三姓村的村长有着病态的权利崇拜，自身的道德缺陷使他们的努力不仅靠不住也不起任何的作用。在《日光流年》中，生与死进行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对话。作者用倒退式的叙事结构，在小说开头就告诉读者“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由司马蓝的死写到生，从一开始就告知读者悲观的结局，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千方百计自救的故事，没有任何的希望和前途。作者用宏大叙事结构，以大跃进、饥荒和大规模的污染等荒谬事件作为历史背景，向读者透露出对人生与社会悲观的态度。想要医治病态的权利体制，需得对症下药，否则一切皆是徒劳。

二、《坚硬如水》：争权夺利的狂欢

对权力的崇拜与向往，痛恨与反思在阎连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毫不夸张的说权利已经融化到他的文化血液中，权利描写成为阎连科笔下绕不开的话题。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崇拜权力——现在四十多岁了，回到老家，却还害怕我们村的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递烟给他，笑着和他说话。《坚硬如水》发表于2001年，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描写复员军人高爱军和乡村妇女夏红梅的权力斗争史和罗曼史。小说一经发表，就因其对权利的狂热追逐与革命中裹挟的惊世骇俗的性描写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王德威更赞誉《坚硬如水》是阎连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创作。笔者认为《坚硬如水》的魅力在于阎连科以强有力的笔致，漫画式的场景揭示了中国传统权力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文革是一场浩劫，对一代中国人来说文革的荒谬与残酷不言而喻，对于如何去呈现这场劫难是每个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阎连科摒弃了先锋文

学与反思文学的写作方式，用超现实的写作手法把文革刻画成一场闹剧，所有在其中争权夺利的人都要丑态百出。

高爱军是中国权利文化造就的典型，在追逐权利的过程中他不断迷失自己，在权利中沉沦和堕落。高爱军与夏红梅的革命爱欲是病态的，权利的诱惑在此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弗洛伊德在性本能理论中指出：“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性是欲望的基础，吊诡的是，高爱军这样一个欲望极强的人却有性无能的病症。由此，高爱军与夏红梅为了权利的结合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权利的解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争权夺利的狂欢中，有无数的牺牲者。其中当属程天青最为典型。程天青的疯是对病态现实的屈服与妥协，在高爱军权利阴影下他“被迫”疯癫。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着不慎就会成为革命的牺牲品。最为讽刺的是，程天青作为一个革命者却被“革命”了。程天青的疯是必然的，他的疯癫是高爱军病态权利欲的牺牲品也是时代的印记，只有程天青无法开口“讲话”，革命的障碍物才得以清扫。这使得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革命作为追逐权利的私人化工具，被披上一层利己化外衣，未免使人汗颜。

三、《受活》：权利与金钱的病态崇拜

《受活》可谓是阎连科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大胆尝试，通过特殊的结构模式、新奇的语言机制等呈现了人们对权利与金钱的病态崇拜。受活庄坐落于耙耧山脉深处，是一个残疾人的聚居地。在茅枝婆带领村民入社之前，受活庄本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像极了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村民虽与世隔绝但自给自足，生活也算是自得其乐。在接受双槐县的管辖后，对权利极端狂热的县长柳鹰雀发现了残疾人身上隐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妄想通过残疾人的“绝术”表演来赚取巨额财富以购买列宁遗体。这本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听起来甚至有些荒唐。但作者却用几十万字的篇幅认真勾勒这样一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世界，说服读者去探寻这场闹剧的内核。

受活庄是一个权力场域，在此出现了茅枝婆和柳县长这两位有着巨大影响的权利人物，他们在“购列计划”斗争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是被权利异化的灵魂。茅枝婆是曾经的红军女战士，在机缘巧合下她来到受活庄并成了受活庄的领导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茅枝婆的领导权完全来自村民对她的信服，是自发的，不受任何势力的压迫，所以这种权利也极易被瓦解。柳鹰雀是一名孤儿，由社校的老师抚养长大。由于出身低微，他格外渴望获得权利，希望借助权利爬到社会的顶层，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领导方式中，茅枝婆与柳鹰雀就有着巨大的差异。茅枝婆的统治更像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一切都顺其自然，倒也是把受活庄治理的井然有序。柳鹰雀则是在现代化浪潮中追求权利的典型代表。权利带来的快感使柳鹰雀愈加膨胀，他创造了一个“发展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不仅膨胀着柳鹰雀的做官梦也滋润着受活庄人的发财梦。

权利与金钱异化思维的同时也在异化着行动。作为被边缘化的群体，残疾人比圆全人更加需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他们生理上的残疾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外在的病态增加了他们的可观赏性。“断腿猴的节目是独腿飞跑，聋子是耳上放炮，单眼儿是左眼穿针，瘫媳妇是叶上刺绣，盲桐花是聪耳听音，小儿麻痹是脚穿瓶儿鞋，哑巴伯是心领神会。”他们并不是在表演绝术，而是在出卖灵魂。

在展示自己残缺的身躯从而获得金钱的同时，他们的尊严也被践踏了。绝术团的成员和马戏团的猴子并无两样，在疯狂的表演中，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也被消解了，作为人的尊严彻底让位于对财富的贪婪。残疾变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权利与金钱的载体。更使读者感到讶异的是绝术表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城里人都一笼统地疯了呢，像大人娃娃都得了羊角风，一说到双槐县残人绝术团，那大人娃娃就把饭碗、筷子放下了，兴奋得嘴角吐沫了。”圆全人作为观众去观看绝术表演是疯狂的，圆全人的这种疯狂恰恰使他们成了被审视的对象。这种看与被看的模式延续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让我们在观看中不断审视被异化的灵魂。“购列计划”的失败直接导致柳鹰雀领导生涯的终结，最后作为圆全人的柳县长轧断了双腿之后留在受活庄。这种自残行为可以看做为对残疾人的精神补偿，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权利代表的精神回归。一切落下帷幕之后，我们不禁要思索一个问题，何为完整？何为残缺？

结语

在社会经济政治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的异化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阎连科在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大背景下书写权利对人的异化问题，其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营造出强烈的荒诞感和陌生化效果。在对权利的病态崇拜中，人性的纯与善被消解，文明也遭到毁坏。权利的膨胀带给人无尽的痛苦，使人丧失尊严和作为人的主体性。这都是作者对于权利崇拜的关照与思索的结果，这种思索最终指向的是对幸福人生的不懈探索。阎连科建构出一个又一个寓言化的村庄，这些村庄远离现代文明，更像是他的一个乌托邦想象，投射出作家人文关怀的同时也承载着发人深省的批判。阎连科对于权利的书写和对当代文学新形式的创造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他在直面历史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索的作家。

参考文献

- [1]陈思和.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J]. 当代作家评论, 2002(2)
 - [2]洪治纲. 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阎连科小说论[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5).
 - [3]程光炜. 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5).
 - [4]王德威. 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5).
- 注释:
- [1]阎连科. 《日光流年 自序》[M]. 吉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 [2]阎连科. 《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演讲集》[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 [3]梁鸿. 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J]. 《文艺争鸣》, 2004(2).
 - [4]阎连科, 张学昕.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5]阎连科. 《日光流年》[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 [6]阎连科. 《一派胡言: 阎连科海外演讲集》[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7]阎连科. 《受活》[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 [8]阎连科. 《受活》[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